

近代日本官话读本中的北京书写^①

——以《北京风俗问答》为中心

宋莉华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摘要: 文章以《北京风俗问答》为中心,讨论近代日本官话读本对北京的书写,考察1920年代北京在从传统的帝都向现代都市转变过程中的社会状况。该书作者利用在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的微观环境中所保存的丰富资料,再现了当时北京社会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常态。这种作为他者的书写,既表现了作者因来自异质文化而特有的敏感与独特视角,同时作为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人,该书作者的书写还体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视角。

关键词: 近代;官话读本;北京;《北京风俗问答》

关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城市先后经历的现代化进程,近年来已日益受到学界关注。^②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几乎无一例外地贯穿了每座城市。对代表了中国式城市的典型和长久作为帝都的北京,这种冲突又格外剧烈。因而以北京作为个案,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审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拟以《北京风俗问答》为中心,讨论近代日本官话读本对北京的书写,考察1920年代的北京在从中国传统的帝都向现代都市转变过程中的社会状况。出于外交和军事需要,日本自1876年开始大力推行北京官话教育。如果说,在教学之初,日本师生还苦于没有教科书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不久,这种状况就得到了改善,专供日本人使用的北京官话读本相继大量问世。由于多数作者都有在北京生活的经历,所以其中相当一部分以书写北京城市生活为

内容,如《言文对照北京纪闻》、《官话北京事情》、《京华事略》、《北京市井风俗篇》、《北京官话眉前浅话》等,而《北京风俗问答》一书尤为特别,是研究当时北京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该书由加藤镰三郎著,冈本正文译,大阪屋号书店大正十三年(1924)9月初版,昭和十四年(1939)8月第6版,在当时广为流布,为习中国语学生所推崇。作者在“例言”中称,本书是他早年留学北京时所录该地的人情、风俗及其他世态。加藤镰三郎另著有《新名词会话篇》(1924)、《新新实用支那语会话》(1925)等。冈本正文是东京外国语学校本科第一期学生,明治三十三年(1900)毕业,以副教授之职赴中国任教,编有《支那声音字汇》、《支那语教科书发音编》、《北京纪闻》等。

《北京风俗问答》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是由于其中对北京的描述,并非停留在城市建筑、节日、庙会等外在的城市形态上,而是专注于市民的

基金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资助项目(Y0401)

收稿日期:2007-01-10

作者简介:宋莉华(1971-),女,浙江宁波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都市文化研究。

日常生活。作者将触角深入到城市生活的细节处,使我们有可能从传统的社会范畴的宏大叙事中跳出来,利用其中在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的微观环境中所保存的丰富的资料,选择具体的研究对象——如当时出现的新的组织:警察、慈善机构、环卫工人的组织等,或者选择更具体的城市空间——如电影院、公园、家庭等,以精确地再现构成当时北京社会整体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常态。^③

一、城市空间的演变

“空间是实践的场所。”^{[1](P117)}一个城市的性质与功能决定其空间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通过城市空间,我们最易于感知城市的变化。北京,作为连续几百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首都,是帝国力量在空间和物质上的体现。当帝制覆灭时,作为帝室象征地位开放的空间,就会逐渐消失。“从1914年到1926年这12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以前全部的御花园和皇家庙宇都向公众开放了。一位近代西方作家写到,‘以前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悠哉游哉的场所如今变成了普通市民的桃园仙境。’”^{[2](P186)}1914年10月10日,由社稷坛改造成的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它是北京的第一个近代公园。公园是近代城市所特有的产物,是城市近代化与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但是由于人员混杂,管理不善,也经常上演“武剧”：“昨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儿,我同着几个朋友正在那儿喝茶哪,就听见一片打架的声儿从西边球房里出来,又听见有人嚷嚷说是打死人了。……就听见这个三十来岁的堂客说,他姓刘号叫燕堂是安徽人,在交通部统计科当差,住在太仆寺街新建胡同。今天是在球儿房打球,碰见这几个野蛮东西。原是他们先打球,打完了应当我们打,他们忽然又不许我们打了。因为这个就闹起来了。他们不由分说大家打一个儿,就把他给打背过气去了。”^{[3](第八章)}中央公园已然变成了市民的乐园,上演着各种普通人的悲喜剧。贵族宽敞、豪华的私人宅第,也被迫部分向公众开放。满人那种殷实体面、秩序井然的生活也走到了末日。庆亲王奕劻的家产被后人变卖殆尽,庆亲王府被人戏称为“拍卖场”,^{[3](第五十二章)}前清中堂那桐把金鱼胡同的那家

花园租给人家办喜事、庆生日,“没想到堂堂的宰相府,到了民国会成了一个大家的会馆了”。^{[3](第四十六章)}

作为现代都市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的电影院也在日益发展：“现在北京的电影儿有点儿发达了。西城绒线儿胡同的中天电影儿买卖很是不错。东安市场被烧的真光电影儿,也在东华门外头。重新建盖新式楼房,将来开张的时候儿一定是大有可观了。……前门外大栅栏儿有个大观楼,他那儿是起首第一演电影儿。”此外还有东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等。新兴的电影在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上,与传统的大戏、杂耍等展开了激烈竞争。城市空间的演变,如果没有带来市民生活的相应变化,这个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新的建筑和城市空间,构筑起了现代市民的生活环境。当这种归属于个人的秩序和场所被认为是自然和永久的时候,现代市民就诞生了。

城市空间的变动还体现在整个城市结构的调整上。“北京的房价在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本不甚贵。到了光绪二十六年,房价可就有点儿抬高了。所以抬高的缘故,是因为北京使馆扩充租界,把正阳、崇文两个城门中间儿的房子,拆了有一万多间。到了宣统年间,忽然间房价可就起来了。在那个时候儿,虽然比从前贵了。可是上等房还不过一元五角,中等房不过八毛,下等房不过四五吊钱。这次房价又长的缘故,是因为南省人在北京谋事的慢慢儿多了。到了民国元年,房价又稍微的低落一点儿。到了民国二年,房价可又长起来了……这是因为政府的人物全换了南省人,所以谋事的也全是南省的人。北京城的这个地方儿,忽然加上这么些个南省人,要在这儿住,您想想人多房少,房价怎么会不特别的贵哪!”^{[3](第十七章)}这种由于城市密度的增加而导致的房价攀升,正是现代城市的城市病之一,提供适当、良好的住房是城市危机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改变和创造公共空间的努力常常遭到来自政府的反对,这也证明了城市公众要打破原有的帝国空间是多么困难,在现代市民与传统封建势力的博弈中,常常以市民的失败告终。比如北京的城墙在当时已不起防御的作用,又极大地限制了北京的发展,但是该书作者认为,北京还不到拆墙的程度:一则北京市政公所由

于缺乏经费,无力发展北京市政。二则,原先新华街本打算在前门西边重新开个门洞,以连接城内城外的街道,以利交通。由于风水先生说这个城门不能开,开了不利于大总统,因此作罢。开城门尚且这么费劲,拆除城门就更难施行了。^{[3](第七章)}城墙是相对永恒的帝国空间秩序的习惯,是皇权稳固的象征,1920年代的北京执政者尚难摆脱这种习惯思维。在《北京风俗问答》问世的1924年,中国的新国都也在酝酿之中。孙中山认为北京是停滞的城市,无法满足作为新国都的需要,它充斥着太多陈旧、无用的建筑和处处阻挠的保守人士。^{[4](P129)}

二、市民生活的变迁

来自国外和外省的大量人口聚居北京,迫使北京在城市结构上所做的变动,对市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祖祖辈辈居住在老北京的固定人口,淹没在新来的人流当中,原有的邻里生活方式受到了破坏。家庭结构虽然保持着传统旧式的大家庭的模式,但已难以维系。在古代中国,城市里的大家庭与农村的大家庭并没有太大分别。城市里的大家庭也往往建立在拥有大量农田的基础上,以维持家庭开支。而当北京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城市向近代城市过渡时,维系大家庭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维持一个大家庭牵涉的问题非常多,家庭成员之间也矛盾重重。即使在较小的大家庭里,也潜伏着父子、婆媳、兄弟和妯娌之间的冲突。结果是这种大家庭制度危机四伏,摇摇欲坠。^{[5](P294-297)} 作者认为应该打破大家庭制度,改为小家庭,这样就“绝没有家长受罪的情形了”。但他也承认这不容易做到。“可是中国人不能分居另过也有两种理由:一种是不愿意分家。因为不能独立,离开父母,他就不能活着。这才养成一个倚赖性。自己跟自己的妻子、老婆、孩儿全都要吃要喝,还要拿俸钱。您说,这种的日子他能不着急么。一种是不敢说分家。自己虽然能够独立,离开父母是不至于挨饿了。可是他怕他一说分家,不能得父母的同意,至少总得挨一顿骂。又怕有亲戚朋友笑话他,说他是不孝,所以没法子,只好暂且忍耐罢。他所挣的钱是瞒心昧己,不能全交在家里,甚至于还要挑鼻子弄眼。您想,这样儿的家庭,他能好的了

么?”^{[3](第十三章)} 由于传统观念或经济的原因,大家庭制度还勉强维持着,但离解析之日已为期不远了。

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深入北京人的生活。城市生活所要依赖的人比乡村人口多得多,社会裂化,出现了很多新兴的行业与市民群体。人力车于1874年传入中国,光绪初年被引入北京,在北京的城市交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代北京的工业落后,发展缓慢,在没有其他就业途径的情况下,拉人力车便成为众多下层贫民的必然选择。《北京风俗问答》写到一位前清的举人,迫于生计,已经45岁,也顾不得斯文拉起了洋车。而且向乘客自曝身份,以博得同情,原谅他的拉车技术。这一现象,与北京城市的特征及城市社会转型对北京的城市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分不开。北京一度聚集着大量纯消费人口,依靠封建特权得到供养。随着城市功能的现代转型,城市的社会结构由传统的等级制度向现代的职业功能演变,其特权地位丧失,所以那位举人不得不以拉人力车作为最后的谋生手段。^[6] 1924年北京引入电车,给北京的7万洋车夫再次带来冲击。1923年北京的公用人力车有24,000辆,1925年减至18,899辆。这些人既无法被安排到铁路、电车公司工作,电车公司筹措35万元设立工厂的救济计划,在作者看来也靠不住。“民国办事是有名无实的。只要自己合适他就不管人家死活。就是立了工厂也是无济于事的。”^{[3](第五十九章)}

警察也是北京近代社会新兴的群体。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设立安民公所,联军撤离时便改为警察署。“前清所办的新政像警察、邮政、电灯、电话、自来水这五样儿,到了现在就是邮政跟警察很有进步。”“警察所以进步的缘故,也实在由于教育的发达。北京的高等小学毕业生跟中学毕业生,因为家里很穷,所以大多数都当了巡警了。警界的官吏也知道这个情形,所以考巡警的时候儿是一回比一回的严。七八块钱的巡警也要作个二三百字的文章,才算合格。”^{[3](第五章)} 警察进步固然可喜,但其进步是由北京城市发展滞后、职业竞争激烈所致,反映了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不足,无力吸纳人口就业,与当时的沿海开埠城市形成巨大反差。

三、市政管理与城市功能

如果说,在旧中国,“城市”与“乡村”并非截然不同的范畴,那么,这一时期的都市化进程,则要求北京具备现代城市的机能,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因为对于生活在城市及其周围的人来说,规范的行动才能使城市空间变得有意义起来。

然而在作者看来,北京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北京市政府的管理能力大可质疑。金钱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相应地,出现了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卖马肉的马肝铺,专找人下毒,毒死人家的马以后再廉价买来牟利。^{[3](第七十六章)}人贩子林立,专买十几岁的小姑娘,买来养着,然后根据其长相、行事,决定她的去向。^{[3](第八十一章)}中药铺的人不卖真正地道的药材,拿假货充数,没有疗效,导致了中药铺和中医衰落,西药房大行其道。^{[3](第六十五章)}北京人冷天有喝牛奶的习惯,当时的英和牛奶公司,牛奶质量最好,价钱偏高,一些小奶茶铺于是向英和交纳少量名誉费,打着它的旗号向顾客收取高价,顾客多花了钱却买不着好东西。^{[3](第三十四章)}此类事件,比比皆是,触目惊心。这一幅幅老北京社会生活图景,反映出这座古都正在经历着的深刻变化。

即便在火车站、医院这样的公共场所,也有公然的欺诈。“北京的规矩,只要有势力的买卖,就没人敢惹。电灯不亮,电灯公司是照旧的要钱;摘下耳机子没人理,电话局也是照旧的收款。惟独到了火车,总算是强的多了。不论如何,你买那儿的票,他总得把你送到那儿去。售票员他拿着铁路跟电灯电话一比较,铁路是不上算的了。他替铁路局抱委屈,所以他想着法子去冤人。”^{[3](第四十七章)}鼎鼎大名的协和医院,也办事拖沓官僚,有很多庸医混迹其中,甚至于“现在医院的黑幕是闹出吃喝嫖赌抽大烟来了”。^{[3](第五十三、九十三章)}

城市的卫生状况更是堪忧。猪羊随意屠宰,血污满地。众人围观,又造成交通拥堵。市政府苦于没有经费开设屠宰场。商人提出要包办屠宰场,警察厅又担心难以控制而不批准。所以只能听任这种状况继续。^{[3](第六十九章)}东城的排水设施为暗沟,由东直门、齐化门、哈达门三处城墙底下

通到护城河,称为水关儿。由于护城河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河底高于沟底,一到雨天,就污水横流,恶臭难闻。尽管警察署派清道夫修理各处暗沟,也于事无补,治标不治本。^{[3](第十一章)}此外,如北京夏天出殡时尸体臭气熏天,粪便清运工推着车子满街乱串等都得不到有效的管理。^{[3](第五十六、八十章)}

20世纪初叶,资金缺乏是北京公共工程建设和市政管理的最大障碍。市政公所主要有两大资金来源:一是中央政府拨款;二是市政税收,来自店铺、机动车辆、剧院、妓女和妓院、财产的出售和转让等征税。但中国在当时没有个人所得税,这一税收体制是远远不够的。^{[2](P173)}一面是经费缺乏,一面却是经费的浪费。民国成立以来,清明节改为植树节:“到了清明,地方上有种树的开支。植树的人员,有坐马车的,有坐电车的。到了植树的地方儿,叫人替他种一棵树,就算完了礼节了。他们可以借着这个典礼,到城外头逛一逛,进了城,有吃应时小卖儿的,有吃英法大菜的,这可都算在植树的开支里头。酒足饭饱,回家一睡大觉或是打几圈麻雀牌,就算完了事了。您若问一问他种树的方法,地土的好歹,他是全然不知。所以每年所种的树,种上就死,死了就扔,扔完了过年再种。”^{[3](第八十九章)}政府一面严厉禁烟,警察厅捉拿烟犯,一面烟土畅销,“您看看政界的伟人,十位准有五位抽大烟。军界里更是了不得了”,“现在北京的烟土分为三种:一是东土,二是北土,三是西土。东土是东三省出的,三省军界包销。北土是口外一带产的,热河儿军界包销。西土是山西种的,山西军界包销。总而言之,就是张作霖、姜桂题、阎锡山贩卖烟土而已。烟土箱子上封上封皮,写上某军界用品,到了税关立刻放行。所以能够畅销各地。”^{[3](第五十七章)}

民国初期的北京,政府和个人都表现出了对国家和公共观念的淡漠。政府在城市的诸多方面管理缺失,对于存在的问题不能产生足够明确的或可以预见的解决办法。民间组织和公共领域则抓住国家不能积极有效地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的机遇而实现自身的迅速发展。如北京的公园就是官方和私人力量、市政机构和地方士绅及商人共同创建的结果。^{[2](P160)}孔教会、悟善社等民间组织异常活跃,还出现了民间慈善组织一文公司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又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

题,其中充斥着欺诈的黑幕。^{[3](第十、三十七、三十九章)}比如作者写到当时北京流行一种“写会”,实际上是一种民间的集资活动。由于官方法律制度未能演化出对经营风险提供保障的机制,因而有时演变成持久、大规模的冲突。^{[3](第五十章)}

四、结语:作为他者的书写

对自身价值进行客观判断,他者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他者认识与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密切相关。因而通过《北京风俗问答》等著作中日本人对于北京的书写,借由外国人的视角,使北京呈现出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有助于我们对1920年代北京的城市发展进程做出客观判断。这既不同于中国史书的记载,也与中国人撰写北京民俗的书籍,如《帝京岁时纪胜》、《宸垣识略》、《日下旧闻考》、《藤阴杂记》等迥异,涉及了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而不易察觉或不屑记录的内容,表现了作者因来自异质文化而特有的敏感与独特的视角。

同时,作为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人,作者的他者书写还包括了第三种视角,即西方现代文明的视角。因而又与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乾隆时期朝鲜使者所作手记《湛轩燕记》、《燕蓟纪程》、《燕行录》等有很大不同,后者往往以观光客的身份对北京做浮光掠影式的猎奇。近代日本及日本人在确立其民族认同的同时,实施所谓“脱亚入欧”的国策,诸事均以欧美国家为范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文明国”创建基本步入正轨。自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殖产兴业”以来,发展速度惊人。从1866年至1873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2.2%。到1885年,日本只用了15年就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到1890年代,日本又实现了以军事工业为发动机、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日本完全转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因而,日本人以西方现代城市的标准作为衡量尺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如果仅以他者的视角来理解作者对北京城市现状及市政管理的严厉批评,是不够的。作者一反日本早期对中华文明的尊敬与崇尚之风,以冷峻的笔触揭示市民与社会的弊端,常常以

一个文明之邦的国民跳出来,批评北京市民懒惰且没有秩序的平民生活,渲染其不文明、不清洁的生活习惯和卑劣的国民性,指责政府公务人员及普通市民表现出的对国家和公共观念的漠然态度,充满堕落和享乐的社会气氛。“不论什么事情,只要叫中国人一办,立时立刻,就会百弊丛生。”^{[3](第五十三章)}一种相对于中国的自身优越感洋溢于字里行间。这与本书作为官话读本の体裁和用途无关,而是时代风气使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中国观和日本人自身的优越感,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特别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标志性胜利,日本人的自信心极度膨胀,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和朝鲜等邻国,在现代国民和国家的各种价值尺度的衡量下,遭到彻底否定,它们作为文明尚未觉醒的“野蛮之国”成为日本的参照,使日本的“文明之邦”的地位得以凸显。以《太阳》杂志为首的日本各大媒体,发表了《支那国民性之由来》、《论支那人之秉性及对支那之方策》、《支那兵与日本兵》、《征讨清国之结局》、《日清教育之比较》等文,无不充斥着这样一种论调。^{[7](P83-10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风俗问答》等著作只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断章取义的片段式的书写,然而其中所表达的片面的中国观不仅盛行于日本社会,而且反射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反躬自省。日本人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种种言论,虽然富于刺激性却尤其不能忽略。梁启超及长期经历明治话语“洗礼”的鲁迅等人,在进行改造国民性的讨论时,都以不同形式对这些来自日本的“中国表象”表达过某种认同。^{[7](P99-104)}

应该看到,《北京风俗问答》一书对北京城市生活的描述并不全面。但是,不得不承认,其对北京的书写又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真实性,反映了北京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与同时期的上海等城市相比显得滞后的发展状况。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所录皆得之于日常见闻,保存了大量原生态的市民生活资料,不加修饰,几乎可以视为社会调查报告。刚刚经历了“五四”的北京,儒家传统在心灵积习上受到削弱,正处于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过程中,社会问题确实非常突出。传统既坏,现代的法律制度和城市管理机制又缺失,社

会充斥着混乱与黑幕,作者对北京的描述以负面居多也反映了某种程度的真实状况。当时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是日本人学习中国语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的做法。东亚同文书院,就要求学生利用最后一学年的暑假,到中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以政治、经济为中心,包括交通、地理、风俗、文化等。日本外务省还专门为此拨出经费。这种调查固然有其政治、军事意图,但据调查整理、汇编成的地理、物资、物产等书籍,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城市风貌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风俗问答》对我们从某些细节上考察北京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

注释:

- ①本文采用六角恒广的说法,“近代”指的是从明治九年(1876)到昭和二十年(1945)。
- ②相关研究成果有:David Strand 著《Rickshaw Beijing: City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9年版;邱国盛《从人力车看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的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田兵权《简议中国城市的近代转型》,《华夏文化》2004年第1期;习五一《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魏开肇《戊戌变法和北京城市近代化》,《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皮明麻《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近代化》,《文史哲》1992年第5期等。

- ③本文所引《北京风俗问答》原文,都是根据波多野太郎编《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北京风俗问答》,不二出版社1984~1987年版。

参考文献:

- [1]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M].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2] 史明正. 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A]. 刘海岩. 城市史研究[Z].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 [3] 北京风俗问答[M]. 波多野太郎. 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第一卷)[Z]. 东京:不二出版社,1984~1987.
- [4] 马斯格罗夫. 构筑梦想——1927~1937年南京建都经过[A]. 刘海岩. 城市史研究[Z].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 [5] 休·D·R·贝克. 传统城市里的大家庭[A].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 邱国盛. 北京人力车夫研究[J]. 历史档案,2003,(1).
- [7] 刘建辉. 产生自日本的中国“自画像”[A].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Z].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Accounts of Beijing in Contemporary Official Japanese Readers: With Focus 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Beijing Customs

SONG Lihua

(Research Centre of Metropolitan Cul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Concentrating 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Beijing Customs*, this paper discusses accounts and descriptions of Beijing in contemporary official Japanese readers and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Beijing in 1920s when it was being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mperial capital to the modern metropoli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who drew upon plenty of references well kept in a micro-environment of urban space and urban society, re-represents the normal states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Beijing community at that time. Such accounts or descriptions of Beijing produced from the angle of a foreigner not only manifest the writer's unique sensitive power and peculiar perspectives as an observer from a heterogeneous culture, but also embody the writer's perspectives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a Japanese who had experienced the Meiji Reformation of Japan (1868).

Key words: contemporary times, official language readers, Beijing,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Beijing Customs*

(责任编辑:陈吉)